

近代史所学人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邱志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自建月以来,即在近代史学科的框架下,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并在中外关系史、晚清政治史等领域的义和团运动专题史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代史所学人不仅以其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全国的义和团研究,而且在义和团研究的学术组织工作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可以说,近代史研究所的义和团研究是全国义和团研究的一个缩影。它的成就,它的缺陷,反映了那个时代全国性的学术潮流。近代史所的学人们身处这一潮流之中,又在相当程度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着潮流的发展。

关键词 近代史研究所;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K25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87(2019)05-0025-08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19.05.0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名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行设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由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于1950年5月组建而成。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新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制的确立。在其后数十年中,该所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农民运动,在革命史观和中国近代史学科框架内,曾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之一,理所当然地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近代史研究所先后有荣孟源(1913—1985)、丁名楠(1917—1999)、庄建平(1939—)、张海鹏(1939—)、贾熟村(1930—)、马勇(1956—)等20余位学者在此专题领域潜心深耕,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检视1950年以来近代史研究所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与国内学界整体义和团史研究发展脉络相一致,表现出特定的时代特色。同时,其学术关怀和研究重心亦具有鲜明的近代史研究所特色。

一、学科奠基与资料集成(1950—1966年)

1950年至1966年既是近代史研究所学科建设的初创阶段,也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受当时国际冷战格局和国内反帝斗争的影响,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批判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侵华政策等方面。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范文澜即将1947年在延安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修订出版,其中有关义和团的许多论点,对近代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义和团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后,刘大年1951年出版的《美国侵华史》和荣孟源1954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这两本专著,对义和团均有专门讨论。此外,这一时期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发表与义和团有关的论文和文章有13篇。这些成果大体反映了以“阶级斗争”、“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下义和团运动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的国内学界状况。如在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上,范文澜称赞义和团运动“充

收稿日期 2019-01-22

作者简介 邱志红,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法制史、华侨史。

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坚强的反抗精神”，“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野心，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1]398}。黎澍称赞“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一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他们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2]。刘大年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称赞义和团的“爱国热忱，它的赴汤蹈火的斗争精神，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反侵略斗争的先河”^[3]。在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侵略及揭示其侵略本性方面，余绳武的《“门户开放政策”在美帝侵华历史中的作用》（《历史教学》1951年第5期）一文，通过论述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过程，揭示其试图最后变全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野心。丁名楠、张振鹞在《从义和团运动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新建设》1960年10-11月合刊）一文中，将美国看作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元凶，称“美帝国主义是参加这次武装镇压的主要刽子手之一”，是“中国人民最险恶的敌人”。

这一时期近代史研究所最早涉足义和团运动专题研究领域的是丁名楠和荣孟源二位先生。丁名楠1950年8月从浙江大学史地系史地研究室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①，早在与张振鹞先生合作发表《从义和团运动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一文之前，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义和团的论文，如《评翦编〈义和团〉——附金家瑞、林树惠答复》（《新建设》1951年第9期）、《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②、《庚子款赔——一副帝国主义强盗争赃图》^③、《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所谓“东南互保”》^④以及《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其历史意义》（《历史教学》1956年第11期），为早期义和团研究，特别是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荣孟源是近代史研究所学者中最早关注义和团

运动研究并有所建树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早在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时期，荣孟源就得到范文澜的重用，协助其修订《中国近代史》，出力良多。1951年，他在《学习》杂志上发表《洋教士的罪行——读有关天主堂的史料的笔记》一文，其后陆续发表《庚子赔款与1902年农民反抗赔款的斗争》^⑤、《义和团的揭帖》^⑥、《永乐大典和义和团旗帜》（《大公报》1955年12月15日）等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文章。荣孟源也是这一时期近代史学界最早一批注意到义和团揭帖、旗帜等精神层面诸因素的学者之一。荣孟源还参与了旨在加强社会各界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近代史系列讲座，在1954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的7场“中国近代史讲座”中，荣孟源承担了主要工作，为六大主讲人之一^⑦，负责主讲第一讲“鸦片战争”和第五讲“义和团运动”，从中亦可见荣氏在当时近代史学界的学术声望^⑧。

荣孟源对早期义和团研究的重要贡献，还体现于他在义和团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近代史研究所自成立之日起，即注重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发掘、考证和整理。1954年，荣孟源担任主编的《近代史资料》杂志创刊，这是当时国内史学界唯一专门刊载近代史文献史料的学术刊物，实质上也是全国近代史资料的权威收集整理中心。早在1950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50周年，以范文澜为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主编的资料集《义和团》（4册），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第九种最早编纂完成，于1951年率先问世。荣孟源承担了该套资料集的主要编辑工作。《义和团》（4册）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下义和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学者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为义和团运动研究者之案头必备。《近代史资料》创刊后，荣孟源在第2期、第12期上又陆续选编了王崇武翻译的《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以及《义和团文献》两篇有关义和团的资料，后者包括《义和团团

①《干部履历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人事档案。

②《进步日报》1951年9月7日，收入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2-31页。

③《进步日报》1951年11月25日，收入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38-50页。

④《进步日报史学周刊》，1952年2月29日，收入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0-21页。

⑤《进步日报》1951年10月12日，收入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51-59页。

⑥《进步日报》1952年5月9日，收入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70-74页。

⑦其余5人为范文澜、王崇武、邵循正、刘桂五和胡华。

⑧《中国近代史讲座》，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学习处编印，1955年《中国文联举办“中国近代史讲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27日，第3版。

规》(1900年6月22日)、《义和团杂记》、《义和团揭帖》以及《义和团乱语》4种,其中《义和团揭帖》原件即来自荣孟源的个人收藏^①。

1954年,中国科学院为加强历史学科建设,组建3个历史研究所,根据研究时段分期,近代史研究所更名为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直至1959年又恢复原称。这一时期,近代史研究所又将之前《义和团》(4册)中尚未收入或内容有出入的《庚子记事》《庚子大事记》《庚子日记》《庸扰录》以及《高栢日记》等资料结集出版,为义和团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具有学术价值的史料^②。

这一时期,近代史研究所丁原英在范文澜的指导下进行义和团运动史研究^③。黎澍、刘大年、丁名楠、张振鹑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了1960年8月25日至28日在济南举办的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为近代史所学人参与国内义和团运动学术会议之始。黎澍等人在会上宣读的论文给与会学者以重要启发,发表后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后均全部收入《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一书中。

二、学科繁荣与研究精细化(1977—1990年)

1977年5月,伴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更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担任所长。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史学界对原有的观点进行重新认识的勇气,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向和关注点。与此同步,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发展也进入新的时期。

在1977-1990年的14年里,作为政治史、事件史的义和团研究依旧是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并且趋向成熟。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学术专著中有4部论及义和团运动专题。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稿》第3册,系由刘大年率领丁名楠、张振鹑、张海鹏等学者,据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近代史部分扩充重写而成。该书第八章分五小节,分别从“震动全国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和义和团的英勇抵抗”“俄国占领东三省和逼订‘交地’条约”“《辛丑条约》”以及“义和团运动中资产阶级的态度、义和团的功绩”等5个方面,全面论述了

义和团运动^{[5]155-283}。1986年,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出版28年后,由丁名楠、张振鹑等主持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问世,该书第三编第二章“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辛丑和约》的订立(1900-1901)”,运用翔实的中外文资料,论述了义和团时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英国策动“东南互保”,以及《辛丑条约》签订等问题,是这一阶段涉及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议题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专著。该书还附录了由张海鹏搜集整理的《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屠杀义和团民》等义和团运动历史图片若干张^{[6]104-153}。在此基础上,张海鹏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生动、直观地表现了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华北、京津以及各地的反帝斗争,俄国侵占东北等史实。

随着19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的紧张与恶化,揭露和批判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点,开始集中到沙俄侵略上。以余绳武、刘存宽为首的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在1976年(时称中俄关系史组)即已完成《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的编写工作,到1981年陆续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第四卷迟至1987年编写完成,1990年出版,李嘉谷、薛衔天等参加了该卷的编写及定稿工作。该卷第二章专门讨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对沙俄在直隶策动建立军事殖民统治机构的“天津都统衙门”、霸占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和海兰泡、逼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等重要史实均做了详细考察^{[7]178-349}。

除以上所列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专著外,这一阶段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还公开发表了一批关于义和团专题的论文、文章,总数达34篇左右,内容主要集中在揭露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批判苏联学者否定义和团、美化沙俄的观点以及为沙俄侵华暴行所作的辩护等方面,如丁名楠的《老沙皇独占东北野心的大暴露——1900至1903年沙俄胁迫清政府订约出卖东北主权的经过》(《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李嘉谷的《〈辛丑条约〉与沙俄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沙俄与天津都统衙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曾宪权与海风合著的《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青海

①《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1957年第1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人事档案。

师院学报》1980 年第 2 期)、薛衍天的《海兰泡惨案死难人数究竟有多少?》(《历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关于江东六十四屯的屯数、屯名、居民人数的有关资料》(《璦琿历史论文集》黑河地区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1984 年)、《1900 年东三省的抗俄战争及其失败的教训》(《清史研究集》1984 年第 3 辑)等。

在论述俄国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方面,围绕谁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元凶和组织者这一问题,薛衍天、李嘉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成为国内学界的一种主要观点。他们合写的《关于沙俄争夺八国联军统率权问题》(《中俄关系问题》1982 年第 2 期)一文认为,沙俄帝国主义从辛丑条约基础提案的提出到议和大纲的制定,都是主谋者,其在八国联军中充当了“主角”、“元凶”或“祸首”。

关注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仍是这一时期近代史研究所学者的研究重心,除了上述文章之外,庄建平的《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文物的罪行》(《史苑》1983 年第 1 期)、丁名楠的《关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若干历史考察》(《档案与历史》1986 年第 1 期)、《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教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德国与义和团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杜春和的《从〈荣禄存扎〉看〈辛丑条约〉的签订》(《历史档案》1988 年第 4 期)、张海鹏的《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国际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张振鹂的《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等文章均从不同角度论及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诸问题,不仅有老问题的深化和重新审视,也有新问题的开拓与阐发。此外,李嘉谷翻译的《英俄瓜分中国的协定(1899 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1980 年),也是一篇比较重要的资料性学术论文。

这一时期的研究更为精细化。近代史研究所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对以往义和团研究的若干成说进行了考辨和订正。李宗一的《山东“义和团主力向直隶转进”说质疑》(《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孙彩霞的《义和团捕杀白莲教辩疑》(《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丁名楠的《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关于刚毅从涿州回北京日期的讨论》(《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等一系列考辨文章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若干讹

误,推进了义和团相关研究的深入。

20 世纪 80 年代,围绕义和团的性质、地位与再评价,近代史学界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论争,近代史研究所学者积极撰文参与其中,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荣孟源在《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东岳论丛》1980 年第 3 期)一文中认为,对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应有不同涵义的理解,“扶清”包含扶保中国的内容,“灭洋”可以解释为排外。在义和团是否反封建问题上,他在《义和团反帝运动》(《历史教学》1980 年第 11 期)一文中,明确指出“义和团在农村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庄建平也持相似观点。他在与人合写的《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 年第 5 期)、《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清史研究集》1981 年第 2 集)两篇文章中,认为山东义和团多次对抗官兵、浴血奋战,甚至一县或数县义和团联合打击清军,义和团所付出的代价“绝不比在反帝反洋教斗争中的少”,怎么能说“义和团只反帝而不反封建”?

朱东安、张海鹏、刘建一在《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一文认为“灭洋”是义和团运动的口号和斗争目标,其笼统排外的表现形式,正是中国人民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帝思想和原始的反抗形式”,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丁名楠则在《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 年第 1 期)一文中,明确指出反帝与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但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是愚昧落后的标志。因此,对排外既不苛责,也不能一味辩护。

这一时期近代史研究所在整理、翻译出版义和团史料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78 年,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将 1959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庚子记事》重新订正出版(中华书局 1978 年)。此后为纪念义和团运动 80 周年,又相继编辑《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册)、《义和团史料》(上下册)等,以“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分别于 1980 年(齐鲁书社)、1982 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计划编辑出版的《义和团在华北》专刊,因故流产,后仅将其中的《筹笔偶存》单独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系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而成。1980 年,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将清朝驻俄公使杨儒

1900—1901年与俄国商谈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话节略等文件编辑整理，命名《杨儒庚幸存稿》，作为“近代史资料专刊”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张振鹂编辑的《“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等人根据1900年夏到1903年春各方致荣禄的32册函札禀稿选编的《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均是这一时期义和团研究资料的有力补充。

此外，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还翻译、编辑出版了大量义和团相关的外文资料，如丁名楠、余绳武参与翻译、校订的《英国蓝皮书中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李嘉谷翻译、陈春华审校的《维特致西比亚金信件》（《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薛衔天等翻译的《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外文资料》（《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1期）、《俄文文献——有关江东六十四屯的记述（摘译）》（《黑河学刊》1990年第4期）等，都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料。上述这些资料（集）的出版，为义和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一阶段近代史研究所学者除了对义和团的源流、性质、地位等问题进行富有创见性的有益探讨，进一步挖掘、丰富义和团史料之外，还积极参加义和团运动史的学术讨论会，与义和团运动史专题领域学者进行学术交流。1980年11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首届全国性的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黎澍在开幕式上就贯彻双百方针、我国史学研究的现状、义和团的反帝与“排外”问题，以及“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问题做了重要发言。丁名楠、荣孟源分别作了题为《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和《汇报义和团运动的资料编辑工作和一点意见》的大会主旨报告。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学术组织——中国义和团研究会。鉴于丁名楠的学术声望及其在义和团运动史领域做出的学术贡献，会议推举他担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近代史研究所荣孟源、张海鹏当选为理事会理事。此后，丁名楠连任两届理事长（1982年）、担任一届名誉理事长（1986年），张海鹏、庄建平分别当选第二、第三届理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学界的学术交流中，近代史

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开始崭露头角，李学通撰写《教案中的民官夷矛盾》一文参加1987年安徽绩溪“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时，年仅24岁。早期学术讨论会上的砥砺锻炼，促进了青年学者在学术道路上的快速成长。李学通后来担任2013年第八届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在抗日战争史、中国近代影像史等领域也建树颇丰。

三、多元视角与论辩求真（1991年至今）

1991年至2016年的25年，是近代史研究所在近代史诸领域蓬勃发展、开拓创新的重要时期，在义和团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也令学界瞩目。自1990年，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学术的推进和时代的发展，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作为政治史、事件史的义和团运动，在“晚清政治史”学科框架内结合“问题史”的研究视野，继续得到学界重视；二是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和地域史研究方兴未艾，成为学界“新常态”。近代史研究所的义和团研究，继续在前一趋势中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近代史所共出版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8本、译著2本、资料集及工具书3部，发表论文及文章50余篇、综述性文章3篇、译文1篇。

学术著作方面，有庄建平、卞修跃（耀）的《义和铁拳英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卞修跃的“百年中国史话”之《义和团史话》^①两部学术普及读物。庄建平编著的《国耻事典》（成都出版社1992年）、张振鹂主持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对义和团时期八国联军，特别是日本对华侵略史进行了论述。

2010年，在义和团运动发生110周年之际，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推出了两部义和团运动专著，均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是马勇的《1900年中国尴尬》，二是侯宜杰的《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这两本书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马勇的这本书与他200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第4卷《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里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描述一脉相承，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在解读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对1900年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全新解读，并将这一连串事件的前因

^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后收入“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于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

后果作了仔细爬梳和重新考订,比如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与此前发生的民间秘密结社,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后“乙亥易储”的大阿哥事件看作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从清廷内部围绕大阿哥事件展开权力斗争引发政治格局的变化入手,以全新的大历史视角重新考察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清廷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东南互保”、“勤王运动”等问题,重新建构了义和团运动的叙事框架,颇有新意。他的这种研究视角以及观点,在《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百科知识》2008年第21期)、《王爷纷争与义和团战争起源》(《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6期)等文章中有更具体的体现,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一文,不限于以往的侵略与反侵略的革命史书写方式,而是将义和团运动放置在近代化的脉络中重新反思了义和团与晚清政治发展的关系^[8]。

侯宜杰以研究清末新政和袁世凯而闻名学界,《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成书于他修订《袁世凯传》的过程中。他的观点和判断确实“与主流意识不同”,他从分析教案入手,认为教案发生,平民、教士皆有责任;平民诉讼受欺,咎在中国官员;灾荒饥饿才是义和团运动突然爆发的真实的主要原因;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旗号下掠夺财富;说义和团“阻止瓜分”缺少根据;清政府实行新政与义和团无关,且义和团也未推动辛亥革命(台北秀威咨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侯著的出版,尤其是他的《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懦》(《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两篇文章在国内刊物发表后,连同之前的成果^[9]也一并被国内学界注意,引起学界强烈反弹,出现一些与之论辩的书评、论文,侯宜杰也从档案史料、教案具体案例等问题出发,进行了回应,坚持和重申了自己的观点^①。可以说,侯著的出版,在国内义和团研究中引起了一个不小的学术论争,进一步澄清和丰富了学界对义和团的认

识。

闵杰编著的《德国公使照片日记(1900-190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是最新出版的一本义和团运动史图文类专著。该书系作者根据德国公使阿尔方斯·冯·穆默(Alfons von Mumm)当年出版的限量影集《照片日记》选编而成,并配以翔实的历史考证文字。内容主要反映了1900年7月至1902年7月间,德国公使穆默游历中国各地时的观察与视角。穆默是以外交途径解决庚子事变、促成《辛丑条约》签订的核心人物,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的这些珍贵照片,真实再现了八国联军的进军路线、军容军貌、外交谈判等历史场景。

与此同时,近代史所学者将国外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优秀著作也在这一时期翻译成中文出版。1994年,张俊义、杜继东、樊书华(现居美国)和丁名楠的博士生王栋(现居德国)等人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198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2000年,杜继东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199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两本译著均被纳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和学习者的必读之作。2014年,杜继东又出版了柯著的中译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2000年版相比,修订本补译了删节的内容,收录了原书的全部插图,同时将参考文献目录和注释中的外文论文恢复为原文,并增加了柯文的中文再版序言,可谓是柯著的全译本。

论文方面,贾熟村自1997年发表《慈禧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怎样决策》^{[10]24-32}一文后,在2006年至2012年间,集中发表了28篇论文,可谓义和团研究的高产学者。他的论文集中探讨了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之间关系,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以慈禧为首的清中枢^②、主张“扶清灭洋”的清流派官员^③、主张

①《也谈“义和团的真面目”——回应周育民先生》,《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义和团“视死如归的秘密”》,《党建文汇月刊》2012年第4期。

②《义和团时期的慈禧》,《菏泽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义和团时期的光绪帝》,《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义和团时期的奕劻》,《菏泽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③《义和团时期的清流派》,《晋阳学刊》2010年第2期;《义和团时期的载漪》,《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1期;《义和团时期的刚毅》,《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义和团时期的徐桐》,《滨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义和团时期的赵舒翘》,《南洋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义和团时期的毓贤》,《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义和团时期的李秉衡》,《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义和团时期的于荫霖》,《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义和团时期的董福祥》,《菏泽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官员^①、清流派和洋务派的斗争^②、清军系列^③，以及义和团时期的外国人与乡绅^④等。贾熟村从人物群体研究入手，揭示了义和团时期的种种复杂面向。

庚子时期发生在北京的围攻使馆之役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震动中外的事件。这一交织着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复杂事件，有诸多基本史实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界，亟需厘清。郑匡民等人合写的《庚子肃王府之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一文利用翔实的中、日、英三方档案史料，具体探讨了这一战役中最激烈、最重要的肃王府之战。该文通过详细梳理肃王府的战守布防、围攻使馆事件的战斗过程，认为荣禄严格遵照慈禧意旨指挥围攻使馆，并非假攻，而是真打，且战斗异常激烈，但这些战斗均服从并服务于慈禧“以战逼和”的政治决策及其变化，并由此严重影响到清军进攻的路线图和效率。

此外，葛夫平的《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崔志海的《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马平安的《清庚子前后中央与地方的政见之争》（《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等也是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义和团研究论著，对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相关议题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以上论著外，这一阶段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加强对义和团运动史的学术总结与回顾，杜继东的《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庄建平的《50年来义和团运动资料概述》^{[11]239-252}、崔志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是其中代表性的3篇研究成果，显示了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成熟面貌。

发生在2006年“冰点事件”中关于义和团性质

的争论亦值得一提。2006年3月1日，张海鹏在复刊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发表整版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对同一报纸1月11日发表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进行回应。针对袁文中对义和团运动反侵略性质的质疑，张文从基本史实、方法论、历史观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强调“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线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进而旗帜鲜明地指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此后，张海鹏又在多篇文章中重申自己义和团研究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⑤。

在资料及工具书出版方面，为了方便研究者对珍稀史料的使用，2013年近代研究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再版了1982年的《义和团史料》（上、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庄建平参与主编、撰写的《义和团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则从义和拳源流、教案、事件、人物、词语、史籍文物和学术动态等6个方面，展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过程。对于义和团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这是一本方便而实用的工具书。杜继东整理的《台湾、香港地区论著目录》则为国内学界了解港台地区义和团研究的现状和成果提供了可资借鉴与参考的依据^{[11]610-622}。

继丁名楠之后，张海鹏担负起近代史研究所参与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会的工作。从1996年开始，张海鹏先后当选为研究会第五届、第六届理事会（2002年）副理事长，第七届（2007）、第八届（2013年）理事会理事长，庄建平、夏良才、杜继东、葛夫平、李学通等先后当选过理事会理事。杜继东为现届（第

①《义和团时期的张之洞》，《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义和团时期的刘坤一》，《菏泽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义和团时期的袁世凯》，《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义和团时期的盛宣怀》，《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义和团时期的袁昶》，《滨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义和团时期的许景隆》，《滨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义和团时期的王文韶》，《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义和团时期的山东地区》，《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义和团时期中国社会对传教士的态度》，《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②《袁世凯与景廷宾起义》，《殷都学刊》2007年第1期；《对朱红灯起义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③《义和团时期的清军》，《菏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义和团时期的聂士成》，《菏泽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义和团时期的宋庆》，《菏泽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④《义和团时期的赫德》，《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义和团时期的绅士》，《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⑤张海鹏：《近年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的讨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6期；《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理性提升的历程》，《北京时报》2009年8月31日；《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同时应该看到,伴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义和团研究热度的整体消退,近代史研究所虽然依旧成果丰富,但老一辈学者,如范文澜、丁名楠、荣孟源等相继去世,张振鹑、贾熟村、张海鹏等尽管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上述提名的学者中,最年轻的杜继东也已经步入50岁中年学者行列,但相对来说,从事义和团研究的青年学者明显不足,接续乏力。目前国内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起点已经很高,年轻学者要想在此专题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和创新,难度确实很大。而且上述学者也并非专攻义和团研究一个专题领域,而是广泛涉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诸多专题,所取得的成果亦是影响广泛。这或许也是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个学术特色吧!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近代史研究所引进的新人中,已有人开始重视研究个案,从清末教案的角度入手观察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浸礼会的境遇^①,可见,义和团运动研究并不是年轻学者不敢轻易触碰的显学。期待近代史研究所年轻一辈的学者,能继承老一辈学人严谨的治学传统,以更开拓的研究视野和丰沛的学术活力,在义和团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绩。

四、结语

笔者以时间为纬,对近代史研究所建所以来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概况予以简要回顾和梳理,主要聚焦与义和团运动专题密切相关或者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他一些专题研究虽偶有述及,但未作专门探讨,或者一些综合性的学术综述^②,笔者并未重点着墨。限于笔者的学识和水平,很难说已经将近代史研究所的义和团运动相关研究成果一览无余,恐仍有遗珠之憾,但大体展示了近代史所建所以来义和团研究的整体面貌。

概而言之,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自建所以来,即在近代史学科的框架下,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来指导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并在中外关系史、晚清政治史等领域的义和团运动专题史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代史所学人不仅以其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全国的义和团研究,他们还在义和团研究的学术组织工作方面作出了贡献。可以说,近代史研究所的义和团研究是全国义和团研究的一个缩影。它的成就,它的缺陷,反映了那个时代全国性的学术潮流。近代史所的学人们身处这一潮流之中,又在相当程度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着潮流的发展。

[责任编辑 李卫民]

参考文献:

- [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册)[M].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订正第1版.
- [2] 黎澍.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N].人民日报,1960-08-30(7).
- [3] 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N].人民日报,1960-08-30(7).
- [4]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6]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前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8] 马勇执笔.义和团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M]//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9] 1900年5月义和团杀害洋人之真相[J].历史档案,2007(3).
- [10] 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 [11] 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M].济南:齐鲁书社,2009.

Scholars of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nd the Study on History of the Boxer Movement

QIU Zhiho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①张德明:《从英国浸礼会看近代民教关系演变》,未刊稿。

②如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姜涛:《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王建朗、酆永庆:《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崔志海:《近五年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8页,等等。